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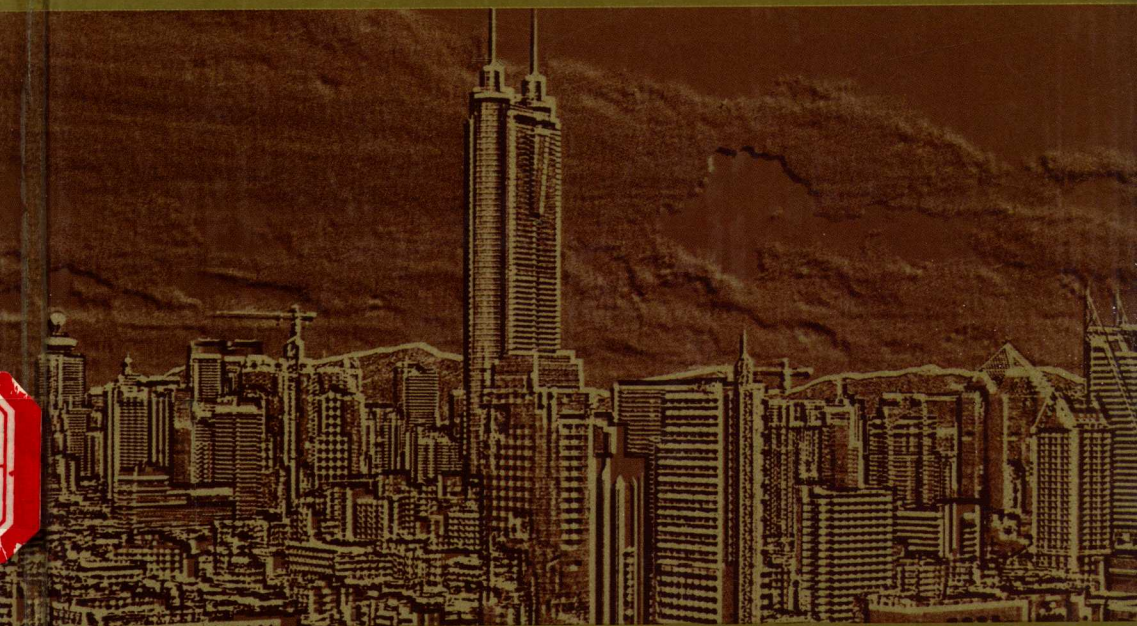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78—1989

8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90—1993

⑨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D223
185/9

1978年

—— 1月 ——

10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文章指出，党的组织部门是贯彻执行党的建党路线，掌管干部政策的重要部门。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尽快把审干工作中的遗留问题处理好。19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切实清理审干积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文章指出，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清理积案，处理审干中的遗留问题，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必然遇到各种阻力，必须排除“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

23日 全国开始统一招收研究生。《人民日报》报道：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最近对招收研究生的工作作了统一的安排，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将1977、1978两年招收研究生的工作合并进行，同时报考，一起入学，统称为1978届研究生。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统一招收研究生工作的开始。

28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讨论给待分配干部尽快安排工作问题。中组部部长胡耀

邦在会上强调，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少数干部需要做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做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该复查的复查，该平反的平反，总之，要实事求是。3月21日至4月2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三批召开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省、市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指出：落实干部政策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是非分明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坚持原则的问题，一句话，是关系到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问题，是要不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好传统的大问题。他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标准：一是没有结论的，应该尽快做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二是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分配适当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要妥善安排；三是已去世的，要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做好；四是受株连的家属、子女的问题要解决好。总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

31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对台湾进行工作问题的建议。中央指出，我们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因而对台工作是当前最大的统一战线工作。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省、市、自治区对台工作任务和组织机构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把对台工作提到具体议事日程，贯彻执行中央对台方针政策。目前主要工作：一是向党内外进行对台政策教育；二是组织对台宣传；三是做好对台胞、台属及其他有关人士的团结教育和落实政策工作；四是开展同台方人士的交往和通信影响工作；五是做好回大陆的台湾各界人士的接待和安置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除西藏外）均应成立对台工作小组。

—— 2 月 ——

18日至23日 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议的任务是为五届全国人大和五届全国政协的召开作好各项准备。会议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各项文件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国务院总理及其他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名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新歌词，决定提请五届人大会议讨论。会议还通过了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候选人名单，决定提请五届全国政协讨论。

24日至3月8日 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政协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政协副主席韦国清作《关于修改政协章程的说明》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决议，一致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乌兰夫等22人为副主席。这次会议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

26日至3月5日 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大会讨论并同意国务院提出的《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新歌词。《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16个月以来的

工作，提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任务，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 20 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左”的指导思想影响，急于求成地提出许多新的要求。例如，《政府工作报告》预计 20 世纪末我国农业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产国家，许多省的工业水平要赶上和超过欧洲某些发达国家；农业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要自动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到 1985 年，钢产量要达到 6000 万吨，原油产量要达到 2.5 亿吨。从 1978 年到 1985 年 8 年间，工业总产值每年要增长 10% 以上。这 8 年，要新建和续建 120 个大型项目，其中有 10 大钢铁基地、9 大有色金属基地、10 大油气田等高指标，在全国形成 14 个大型重工业基地。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 28 年的总和。这样宏大的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不论从资源、财力、技术力量还是建设周期来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方针的执行，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大会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女）、聂荣臻、刘伯承、乌兰夫、吴德、韦国清、陈云、郭沫若、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女）、邓颖超（女）、赛福鼎、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等 20 人为副委员长，姬鹏飞兼任秘书长。决定华国锋继续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陈永贵、方毅、王震、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女）等 13 人为副总理。选举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黄火青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 3 月 ——

18日至31日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近6000名代表。这是由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大会。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华国锋在会上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方毅作了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和措施的报告。在闭幕式上，郭沫若发表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邓小平的讲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原理，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教育事业，大力发扬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强调在我国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的必要性，彻底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种种谬论。他还指出，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要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同时是通过科学研究计划来领导，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科学技术的业务工作，应当放手让所长、副所长分工去做。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自由的讨论。要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邓小平的讲话，澄清了科技事业中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是对科学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上又一次重要的拨乱反正。华国锋在报告中强调，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直接需要，也是在全国范围内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亿万劳动者，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战略任务。报告提出，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必须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的

关系。大会制定了《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表彰了 826 个先进集体，1192 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 7657 项优秀科技成果的完成单位和个人，向先进集体和个人颁发了奖状。大会号召大家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28 日 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同志谈话。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的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精神鼓励是必要的，但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都要恢复。奖金制度也要恢复。对发明创造者要给奖金，对有特殊贡献的也要给奖金。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

—— 4 月 ——

4 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1957 年的反右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在这场斗争中，全国划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有 50 多万人。从 1959 年到 1964 年先后 5 批摘掉约 30 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到 1978 年全国大约还有右派分子 10 万多人。4 月 5 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一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 月 17 日，中共中央批发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 8 月 25 日呈报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并指出：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部分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不要仅

仅从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出发，要统筹安排，细致地做好工作，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所长，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错划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以改正。10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成立了审查改正右派工作办公室，领导全国的右派改正工作。到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到1980年基本结束，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多人，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7%以上，余下的改正工作仍继续进行。右派分子的摘帽和改正工作，不仅解除了几十万人的精神负担，而且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对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0日 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业交通企业试行。这个《决定（草案）》指出：通过整顿，各个企业要建立起精干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要逐步建设一支思想红、干劲大、技术精、作风好、团结紧、纪律严的产业大军。强调要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搞好各项管理工作。企业是生产单位，必须以生产为中心；各个企业都要恢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恢复和建立企业基金制度。提出要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工业，首先组织同一地区的本行业的专业公司，然后逐步地发展跨省市、跨行业的联合公司；要从上到下建立起强有力的各级工业指挥系统，以有秩序地组织生产和建设活动。这一《决定（草案）》是当时指导工交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文件。文件下达后，各省、市、自治区积极组织实施，抓紧进行整顿企业的工作，使一批“老大难”的、关系全局的重点企业较快地改变了落后面貌。

22日至5月16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各省、

市、自治区、国务院各部委、部分学校的负责人及解放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六百余人参加会议。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要求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这篇讲话，为新时期的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作了报告和总结。他就教育工作如何贯彻党中央的指示讲了八个问题：（一）新时期教育战线的任务。（二）深入揭批“四人帮”，把学校整顿好。（三）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四）开展科学实验，加强科学研究。（五）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六）努力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七）全面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八）广开才路，大力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会议代表研究了《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全国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案）》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三个修改意见（讨论稿），还进行了各种专业活动。7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刘西尧在会上的报告和总结。

24日至5月22日 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司法战线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联系司法战线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二是讨论了宣传贯彻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确定了新时期人民司法工作的任务。李先念副主席到会讲话。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大会上作报告。6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纪要》。

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深入开展新时期总任务的

宣传学习运动的通知》。6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基本建设汇报提纲》，再次强调要实现五届人大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纲要，提出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到世界前列。这个目标是不切实际的。

27日至6月6日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军军以上单位负责政治工作的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主持会议并作了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在会上讲话。邓小平在6月2日的讲话中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邓小平的讲话还从根本上否定了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左”的思想，拨正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这次会议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任务和方法。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条例》等三个草案。会后，中央军委于6月26日做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8月9日中央批准颁发了这一《决议》。这次会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次重要的历史性的会议。

—— 5 月 ——

5日 《人民日报》发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邓小平指导下写的、并由李先念审定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文章驳斥了“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对按劳分配原则

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文章指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新的劳动生产率，决不是什么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奖金、计件工资同计时工资一样，都是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行之有效的报酬形式。我国当前的问题不是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得“过了头”，而是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实现。文章号召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坚定不移地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掀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

11日 《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原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文稿经过《光明日报》编辑部、中央党校修改，由胡耀邦审阅定稿，于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新华社于5月11日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相继转载。文章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前，仍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后，在全党、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但中央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在有的场合有同志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一场关系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分歧的争论展开了。

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领导人积极领导和支持这一讨论。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肯定

了这场讨论，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与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生命力。他提出，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有力的支持。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得到当时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支持和审定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较为系统地 from 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所提出的责难，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7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是正确的。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时，再次批评“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9月25日，胡耀邦在信访工作会议上鲜明地提出：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在邓小平等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正确引导和积极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压力，在全国范围展开。这时，全国思想界、理论界非常活跃。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许多地方报刊也都纷纷发表文章，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一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斗争，也是我党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

开始的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开始把人们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逐渐端正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和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22日 《人民日报》发表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的文章《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文章澄清了“四人帮”在商品货币理论上制造的一些混乱，论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论商品生产还是商品流通，从本质上说，都不能提供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并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还发展得很不够，必须大力发展。

24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应立即建立组织，以便开展工作。根据《宪法》规定，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做斗争。

27日至6月5日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北京的文艺部门的负责人和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以及台湾省籍、港澳代表共三百四十多人。会议由恢复文联各协会筹备小组组长林默涵，副组长张光年、冯牧主持。中国文联副主席茅盾致开幕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作了《衷心的祝愿》的书面发言。中宣部副部长黄镇在会上作了题为《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的讲话。会议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

论，践踏社会主义文艺园地，迫害文艺工作者的罪行，并宣布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和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和中国摄影协会也将陆续恢复工作。大会通过了《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决议》，并决定在1979年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 6 月 ——

10日 《人民日报》转发《红旗》杂志特约评论员文章《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文章指出，做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基本要求，至少应包括以下五条：（一）过去受审查需要作结论而没有作结论的，要尽快做出正确结论。（二）已作结论处理但不正确的，要改过来，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三）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分配了工作但不适当的，要进行调整；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关怀和照顾。（四）对受审查期间死去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并把善后工作做好。（五）无辜受牵连的家属、子女、亲友、身边工作人员中应予解决的问题，要妥善解决。党委要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有布置，有检查。

12日 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逝世，终年86岁。18日首都隆重举行郭沫若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悼词对郭沫若革命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指出他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

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长期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越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2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小组的通知》。中央政法小组由黄火青等6人组成。10月13日，中央政法小组召开座谈会，商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问题。赵苍壁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陶希晋作了关于修改、起草法则问题的说明。他说，初步考虑，原有法规急需修订、重新公布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森林保护条例》、《发明奖励条例》等28个法规，急需新制定的有《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环境保护法》以及《关于婚姻问题若干规定》等6个法规。

23日 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湘乡县委《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中共中央指出，要坚决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从各方面减轻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任何部门和单位一律不准无偿平调社、队劳力、财政、物力，搞非生产建设，坚决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做到增产增收，多劳多得，分配兑现。7月5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的社论。

—— 7 月 ——

6日至9月9日 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议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20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这一目标是在对“四人帮”长期破坏造成的严重恶果认识不足，对近两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估计过于乐观的条件下确定的，要求过高过急，是不现实的。但这次会议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大胆地提出了一些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会议强调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在经济管理工作中，要坚决摆脱墨守行政方式的老框框，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要改变手工业式、小农经济式甚至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要保障工农业企业的必要的独立地位，适当扩大它们的经济自主权。李先念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根据过去28年的经验，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还必须同外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决不能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为了推进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提出改革工资制度、奖励制度、劳保福利制度的意见，制定推行合同制、成立专业公司的办法，制定改进更新改造资金、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具体方案。